

#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72 ·

歷史·地理類

中國歷史散論

曉風著

中國歷史論集

呂振羽 翦伯贊  
華岡吳澤

哲夫等著

中國史論集

翦伯贊著

中國史論集（第二輯）

翦伯贊著

上海書店

---

# 中國歷史論集

呂振羽 翦伯贊

華 崗 吳 澤

哲 夫等著

本書據東方出版社1945年版影印

# 目 錄

|      |                   |         |
|------|-------------------|---------|
| 吳 澤： | 中國歷史研究法……………      | ( 一 )   |
| 翦伯贊： | 略論中國史研究……………      | ( 三一 )  |
| 翦伯贊： | 實驗主義中國歷史觀的批判…………… | ( 五四 )  |
| 華 崗： | 評侵略主義的中國歷史觀……………  | ( 七〇 )  |
| 呂振羽： | 中國社會史諸問題……………     | ( 九六 )  |
| 呂振羽： | 中國歷史研究提綱……………     | ( 一五二 ) |
| 哲 夫： | 中國歷史著作論……………      | ( 一八四 ) |

# 中國歷史研究法

吳 澤



我們認為：只有用新的科學歷史觀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才是唯一正確的方法。辯證法這字是從希臘字「辯論」而來的。古代對辯證法之了解是指發現對手的談論中的矛盾及克服這些矛盾的方法來獲得真理的藝術。

辯證法是根本上和形而上學直接相反的。

1. 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假如一切現象都互相聯結着，互相依存着；那麼，很明顯的，對於歷史上每個社會制度和每個社會運動就不應該從「永恆的正義」，或者任何其他預定觀念的觀點上去判斷他（如不少歷史家之所為），而應該從產生這個社會制度與社會運動及與它們相聯結的各種條件上去判斷他。

因此，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天命論，「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以及所謂「正統偏安」，「大義名分」等等永遠不變的善惡的概念，絕

對的無條件的倫常觀念的「永恆正義」的學說，都不合乎科學。

奴隸制度在現代條件下，是糊塗，是反自然的蠢事。奴隸制度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了解及合規律性的現象，因為他較之原始公社制度是前進一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的中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民主共和國的請求，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是正確的與革命的要求，因為現在在歐洲雖然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能算是前進的，而在中國則是前進的。

一切決於條件、地點與時間。

斷然地，如果沒有這種對社會現象底歷史的態度，那麼歷史科學的存在與發展是不可能的，因為祇有這種態度，才能使歷史的科學不致成為偶然性混亂與盲目的錯誤的堆積。

2. 世界是在不斷的運動與發展中。假如舊的死亡和新的生長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白地，沒有什麼「不可動搖」的社會制度，沒有什麼私有財產和剝削的「永恆原則」，沒有什麼農民必須服從地主，工人必須服從資本家的「永久的原則」。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以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的，恰似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曾經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樣。

這就是說：不應該依據不再向前發展的（雖然現在還是佔優勢的）社會階層，而應

該依據正在發展着的有其將來的社會階層，儘管這階層在目前尚不是佔優勢的力量。

3. 緩慢的量的變化轉變爲迅速的突然的質底變化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白地：被壓迫人民和民族所完成的革命的變革乃是完全自然的與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就是說：從封建或半封建社會到更進步的社會的轉變和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解放，也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壓迫下的解放一樣，不能經過緩慢的變化，經過改良的道路來完成的，祇能經過封建或資本主義制度之質的變化，經過革命的道路來完成。

4. 發展是產生於內部矛盾的發現上，是產生於根據這些矛盾而來的對立力量的衝突以克服這些矛盾。

在中國近四十年來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底教訓中，也證明了這個真理。當一九〇〇年時代，革命派與康梁的保皇立憲的妥協派鬥爭，自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同盟會成立，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理論確立了，革命鬥爭的方法更加堅決了，因而獲得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推倒滿清，建立民主共和國底初步勝利。但因爲不祥的汪精衛妥協派等，主張與北洋軍閥袁世凱輩妥協，以致革命遭到失敗，革命的任務未能解決，而把他交與革命的第三階段。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代，革命派與政學系的妥協派奮鬥，自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

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行貫徹革命到底的鬥爭。因此就得到了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成功，即北伐的成功。但可惜又遇到汪精衛的叛變，實行國共分裂，同舊勢力妥協投降，使革命又遭到失敗，革命的任務未能完成而又把這任務交與革命的第三階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事變，佔領中國東北四省以來，抗戰派與不抵抗主義者奮鬥，自一九三五年內憂外患，更加緊迫，全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呼聲，響徹國內外，幸各黨各派，卒而各棄成見，攜手合作，尤其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成為團結全國的核心，結成鞏固的抗日民族統一的戰線，因而一九三七年「七七」時日寇的新進攻，就受到了中國全民的反抗，現在中國抗戰已經四年零幾個月了，中國則愈戰愈強，日寇則愈戰愈弱，全國抗戰到底的堅決心與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自信心，日愈強固；雖有漢奸汪精衛的投降賣國，甘心投奔日寇膝下，而已遭到全國一致的致命打擊。祇要我國民堅守徹底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真正實行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而堅決反對投降妥協的份子，中國革命一定能够完成。

這就是應用新世界觀辯證法到社會生活上，到社會歷史上上去的情形。

至於新哲學，那它根本地和哲學的唯心論是直接相反的。

不難了解，將新哲學的論點擴展於社會生活的研究上，社會歷史的研究上，有怎樣

重大的意義，將這些論點應用於社會歷史上，應用於革命政黨的實際行動上，有怎樣重大的意義。

1. 自然現象的聯結及其互相依存性是自然發展的規律，那麼，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結及其互相依存同樣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這就是說：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再不是「偶然性」的堆積了，因為社會歷史是社會的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的研究便變成了科學。

這就是說：革命政黨的實際行動，不應該根據於「傑出人物」之良好的希望之上，如所謂「好人政府」；不應該根據於「理性」「全部的道德」等等要求之上，而應該根據於社會發展的規律上，根據這些規律的研究上。

中國有些歷史家認為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所謂「英雄造時勢」。抱這樣一類觀點的人，往往把人民當作奴隸去看待，因而他們不能不走向輕視人民的力量，侮辱人民，說人民是一般無知的羣氓，要等待英雄去把他們變為人民。如尙書說：「黎明於變時雍」；孟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有些歷史家以唯心論的觀點說，心理可以創造一切，英雄可以創造時勢。如梁啟超說：「史界因果之勢頭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換言之，則所謂「歷史為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即歷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羅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餘人抽出，恐局面或將

全變。」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為頗含一部份真理。……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祕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社會心理者，其物質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復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由人類心理之本身，有突變的可能性。心理之發動，極自由不可方物。無論若何固定之社會殊不能預料或限制其中之任何時任何人忽然起一奇異的感想，此感想一度爆發，視其人心力之強度如何，可以蔓延及於全社會。」（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七〇——一七四頁）卡爾主義者則認為：「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此，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動歷史前進。英雄，傑出人物，如果要在社會生活上能够起重大作用，只有他們能够了解社會發展的條件，了解如何改進這些條件。英雄，傑出人物能够墮入可笑的狀態或為誰也不需要的敗將，如果他們不能够正確地了解社會發展的條件，企圖違反社會的歷史需要，而自稱歷史的「創造者」。」

2. 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我們關於自然發展規律的智識是可靠的智識，有客觀真理的意義：那麼，社會生活，社會發展同樣是可以認識的，而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智識乃是可靠的智識，有客觀真理的意義的。

這就是說：關於社會歷史的科學、不論社會生活現象的如何複雜，可以成為確實的

科學如生物學一樣，可以把社會發展的規律來實際應用的。

這就是說：革命政黨的實際行動，不應該由任何偶然的理由來領導，而應該以社會發展的規律，以這些規律之實際結論來領導。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從對人類良好的將來的理想變成了科學。

這就是說：科學與實際行動的聯結，理論與實踐的聯結，他們之間的一致，應該成為革命政黨的南針。

中國歷史家認為：宇宙是不可測度的，一切歸之於天命人心，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聖人奉天承運，代天立極而為天子。天下治亂繫於執政者之一心，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以及所謂執中的心傳，中庸的大道等等唯心論的觀點，都應該根本肅清，才能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不然，則自己雖號稱為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而終不能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如梁啟超說：「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一六七頁）雖然他也注重物質環境，而始終不能脫離觀念論的觀點，故他不能說明真正的歷史。

3. 自然，存在，物質世界是最初的，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假如物質世界是離開人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乃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那麼，社會的物質生活，他的存在同樣亦是最初的，而他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次的，派生的，社會物質生活是離開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這就是說：社會精神生活形成的來源，社會理論、政治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的發生的來源，不應該從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本身中去找尋，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社會的存在中去找尋。思想、理論、觀點等等乃是他的反映。

這就是說：假如在社會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中看到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假如在奴隸制度下碰到一種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而在封建制度之下另一種，在資本主義之下第三種，那麼，這不應該以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本身的「特質」與「固有性」去說明，而應該以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去解釋。

某種的社會存在，某種的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就有某種的它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

關於這方面有人說：

「不是人民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而相反地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這就是說：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不陷於空洞的夢想家的情況中，革命政黨的自己行動不應該從抽象的「人類理性的原則」出發，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的具體條件出發，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決定的力量；不應該從「偉人」的善良的希望出發，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現實的要求出發。

烏托邦主義者底沒落，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首要的作用，而陷入於唯心論，把自己的實際活動不建築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要求的基礎上，而離開它們，違反它們，將實際活動建築在脫離社會實際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方案」的基礎上。

中國歷史上歌頌的所謂「唐虞盛世」、「大同世界」，以孝和仁義爲「包羅萬象的方案」，同烏托邦主義者一樣，都是一種空想。

革命主義的生命力與力量就在他把自已的實際活動，是依據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要求上，永遠不脫離社會的現實生活。

但是不應該從這些話中得出結論說，社會思想、理論、和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對社會生活沒有意義，說它們不給社會存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以反影響。新歷史觀不儘不否認它們的反影響，而且着重指明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中的重大的作

府與意義。

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老的：過時的，替衰亡下去的社會力量服務的思想和理論。他們的意義就在阻礙社會的發展，阻礙它的前進。有新的：前進的適合社會先進力量利益의思想和理論，它們的意義就在幫助社會的發展，幫助它的前進，而且如果它愈精切地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那麼它的意義來得愈加重大。

中國有些歷史家認為：

「中國的文字，文學是建設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許多蠻族，平定了許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中國比歐洲人失敗的原因，只是少了一個大的和附帶一個小的：大的是科學，小的是工業，……我們明白了這個教訓，比歐洲所缺乏的是什麼，我們的努力就有目標。」（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盛京時報載胡適作「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

胡適這種說法和張之洞一流崇古尊孔的人所謂：「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理論」，都是替衰亡下去的社會力量服務의思想和理論。

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祇有在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新任務之後才會產生。但是，在它們產生之後，它們便成了極重大的力量，能幫助社會的前進。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改造的意義就在

這裏。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的產生，本身就因為社會必需它們，因為沒有它們的組織、動員、改造的工作，就不能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成熟起來的任務。產生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之基礎上的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開闢自己的道路，深入民衆，組織他們起來反對社會中的沒落力量，這樣便幫助了推翻阻碍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沒落的社會力量。

如果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還沒有達到提出新任務的物質條件，而仍然提出新的政治制度，則不但不能實現新制度，而且也不能解決最迫切的問題。例如王莽改土地爲公田（想施行井田制），禁止買賣土地，終不免於農民的暴動；太平天國廢土地私有制而採取土地國有制，分配土地於農民而給與使用，想實行一種軍事共產制度，終究不能實行。這不是農民不需要土地，而是私有制度還在向上發展的階段，還沒有到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的時候，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範圍之後，發展了生產，少數私有者壟斷了生產，集結了幾百萬工人，給了生產過程以社會的性質，發生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而要求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的公共所有。因爲農民有兩重性，是醉心於私有者的勞動羣衆，如果沒有進步的無產階級善於領導他們向更有利益的道路前進，他們是不會拋棄私有欲望的。「祇有解決任務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在成立的過程中底時候，任務本身才會發生」。

因此王莽與太平天國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是脫離了物質條件的空想。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就是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新任務之後，他就會產生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這個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便成了極大的力量而能幫助解決新的任務并使社會前進。這個力量的偉大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征服的。如中國現在推行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是中國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新任務。這個新任務有在內在外的兩方面，在內的任務是徹底肅清封建殘餘，完成資產者民主革命，不打倒封建殘餘，肅清貪污腐化，則內不能圖政治底清明，外不能免強寇底侵略。在外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特別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軍閥的暴力侵略。這就負擔了推翻陷於總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新任務。因為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他同帝國主義是直接的主要的矛盾，不打倒帝國主義則不能解脫半殖民地的束縛，打倒帝國主義尤其主要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軍閥，則它就完成了世界革命中他所應負的新任務。

這樣，產生於由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社會存在的發展所成熟起來的任務之基礎上的新社會思想和理論，以後自己反影響於社會存在，社會物質生活，創造了徹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成熟了的任務并使繼續發展成為可能。「理論如果為羣衆所掌握時，就成了物質力量」。

這就是說：如果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加速它們的發展，加速它們

的改善，那麼革命政黨應該依靠在這種社會思想，社會理論之上。這種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正確地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並由此而能將廣大的民衆捲入運動，從民衆間組成革命政黨的偉大的軍隊，準備着去粉碎反動力量及替社會先進力量開闢道路。

機會主義者的沒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思想之動員、組織、改造的作用，而陷入於庸俗的唯物論，把它們的作用看做等於零，這樣使政黨陷於消極，陷於無所作爲。

革命主義的生命力與力量，就在它依靠在正確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先進理論之上，把理論提高到應有的高度，而且認爲必須澈底使用它的動員、組織與改造的力量。新歷史觀就這樣地解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的問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與社會精神生活發展的關係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就是從新哲學的觀點上看來應該如何去了解那最後地決定着社會的面貌，它的思想觀點、政治制度等等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實際上，什麼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它們的特點是什麼？

無疑地，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概念中，包含着包圍社會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內，這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必需的經常的條件之一。它影響着社會的發展，但是地理環境不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人們社會制度的性質及社會制度的轉變的主要力量。